

1601



王國權回憶錄

第十三
8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巩义市委员会文史委编



一九四八年在热东地委王国权与常玉林合影



1954年，热河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是王国权）



王 国 权



1965 年，毛泽东主席、陈毅副总理与部分驻外使节合影
(前排左起王国权)



1957年在民主德国担任大使时和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总理、议长在一起（左二为王国权）。

目 录

序 言

一、青年时代	(5)
二、东渡日本	(26)
三、奔赴延安,投身抗战	(36)
四、在热河省工作的十年	(58)
五、出使民主德国	(72)
六、出使波兰,参加中美会谈	(81)
七、对外友协和总理特使	(88)
八、澳州三年	(100)
九、罗马回忆	(104)
十、重建民政工作	(108)
十一、全国人大民委和外委工作	(112)
十二、目前工作	(116)
十三、结束语	(117)

序 言

我于1911年12月24日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2年参加革命。那时我正在河南大学读书,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我与河大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同时,参加了党的外围左翼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在王毅斋、嵇文甫、江绍文(开封地下党书记)几位进步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创办了大陆书店,出版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在此期间我还帮助王毅斋教授创办了大同中学,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1934年秋,由于国民党查封了大陆书店,查禁了《今日杂志》、《大陆文艺》,在主持书店工作的郭伯恭、邢啸天同志被捕,在西北中学教书的宋一涵同志也被捕,我和姚雪垠同志也在通缉之列,我被迫离开祖国,东渡日本。姚逃亡北平。在日本我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35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冬因在日本印发抗日传单,被日本当局关押了二十四小时(审讯了四次),出狱后经党组织安排于1936年冬回国赴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平型关战斗打响后,即奔赴抗日前线——不久即组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一分区坚持抗战八年,任北岳区一分区地委书记,抗战胜利后转入热河省和辽西一带工作近十年。曾任辽西

省委副书记和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全国解放后 1956 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工作,开始了我为时二十二年的外交生活。先后出任了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在任波兰大使期间还兼中美会谈代表,1970 年至 1973 年我任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并曾作为周总理的特使赴日本参加了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1978 年,我从意大利调回国,到民政部工作,以后又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曾做人大的民族工作和外事工作。1988 年,我从全国人大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开始从事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文化工作直到现在。

光阴似箭,转眼我已 82 岁。凝眸往事,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六十多年工作是努力的,为党和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不管是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我始终为党的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奋斗着。当然,由于自己学习不够、水平不高,虽然工作有一些成绩,但离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回顾那风雨如磐的战争年代,我的许多老战友为了革命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缅怀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老战友,想起与我建立血肉联系的广大人民,让后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做出的不朽贡献,也是我整理这部回忆录的一种心愿。

我的家乡——河南省巩义市,反复提出要出版我这部回忆录,家乡人民给我的厚爱使我受之有愧。几十年来,我为家乡和父老乡亲所做的事实是在是太少了,加上我

这部回忆录整理得较粗，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本回忆录虽几经补充，但仍不够完整，文字水平也不高，好在它是我数十年革命生涯的大体写照，权当是我向党和人民交出的一份粗浅的答卷。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壮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愿本此精神自勉，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继续奋斗到终生。

王国权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我的历史回顾

我是辛亥革命那年年底出生的。这一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布成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人民仍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翻身解放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回顾历史，我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时代。

而今回首往事，一半是苦涩，一半是甜蜜。说有苦涩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饱受奴役压迫的苦难岁月；说甜蜜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了，人民胜利了。抚今追昔，又衷心地寄厚望于下一代，寄厚望于新中国的未来。

一、青年时代

我本姓康，名午生，字厚庵（是黎明中学时代国文教员送的）。是河南巩县康店村人，故乡地处河南中西部，在古都洛阳东约百华里。记得在我小时候，村上有上千户人家，大部分姓康。我的家住在邙山岭的东坡上，岭前不远

处有座巩王庙，据说是因周巩王曾建都于此，后人为纪念他修建的，巩县也可能是由此而得名。巩县历史名胜很多，如巩县石窟寺、宋陵、包公墓、汉冶铁遗址等。唐朝大诗人杜甫也出生在巩县南瑶湾村。我家的后岭上有三个大墓冢，是杜甫父子的墓。记得我年轻时村头上曾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杜甫故里”四个大字（这块石碑现已掩埋在地下）。因此，我从小时候就知道家乡出了个大诗人杜甫，并常为此而自豪。

我家村前半里地就是有名的洛河，现在河水小多了。我幼年、青年时代河水都是很大的，那时几乎隔一两年就闹一次水灾，河水泛滥，平时河里可行船，上游直达洛阳，下游直接流进黄河。那时可用船经黄河到陕甘两省作买卖。民国初年，刘镇华在陕西作督军，势力颇大，刘镇华老家是巩县神堤村，因此当时巩县在陕甘一带作事作买卖的相当多，遭灾年老百姓逃荒也是往西北走的多。

巩县当时是中原地带还算比较富的县，读书的人较多，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相对丰富一些，村上有几所小学和私塾。村里有地方戏班子，有两个旦角名叫小更和马六（均男性）在当地颇有名气，他们演的戏大家都愿意看，那时演的戏有豫剧，还有曲子和越调。逢年过节就在祠堂前的戏台上演起戏来，还有踩高跷、说书的，过春节时这种活动一般要进行到正月十五。农民们一年四季背朝天，辛辛苦苦在农田里劳动，只有农闲时才能松快几天，不少人尽管仍吃不饱穿不暖，在这时候还要尽情地热闹一番。平

时，村里虽不唱戏，但过一个时期就请来说书艺人，在村里说上几个晚上。吃过晚饭村里男女老幼便相约前去听说话，旧社会的文艺虽少不了封建糟粕，却总是起着活跃人们文化生活的作。同时，它也向人们传播着中国的悠久历史民间传说和传统文化。其中有些还是宣传民主进步的东西，特别是反动派文化统治不太严的农村更是如此。

在我小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还不错，相当于富农（后破产，土改时划为贫农）。记得当时家里人很多，除了我和父母、姐姐外，爷爷、奶奶、叔叔、婶母和几个姑姑都住在一起。受封建家教的影响，在家里最受欺负的就是我母亲，一天到晚干不完的活，还要经常挨奶奶和父亲的打骂，因而很早就过世了。母亲死后，父亲又娶了一个继母，那时，我已到开封上中学，很少回家，因此，同她接触较少。继母后来生了三个弟弟，叫德轩、德本、德超和一个妹妹叫惠轩。弟弟在我任热河省委书记时都在我身边读书长大，现在三个弟弟分别在邯郸、张家口和黑龙江工作，妹妹一直和继母住在老家，继母现在已去世。

在我的家族中，祖父康方高是个练武功的，曾考清武举未中。当时，家中楼上除放些书外，还放有不少刀弓箭一类的武器，院子中央放着一块方石，叫志石。是爷爷练武用的。大爷康方正曾考中武举，在清朝乾隆统治时期做过御前侍卫，前后娶了三个老婆，年老还乡、在旧中国算个乡绅，较有名气，乡里还送过他一个匾“端方正直”，挂

在家门口。二爷当过县陪审官，也教过我认方块字，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我家六爷，他是个地主兼高利贷剥削者，并开了一个大烟馆，他对老百姓放债，进行残酷的剥削，他前后娶了三个老婆，二姨太和三姨太都是从佃户家的女孩中挑选出来的。二姨太因娘家姓华，我们叫她华奶，三姨太姓孟，我们叫她孟奶，由于华奶未能为六爷生孩子，而孟奶生了一个男孩（永昭），故六爷宠爱三姨太，虐待二姨太。记得在一个夏收季节，乡亲们都忙着打麦场，忽然有人惊传二姨太跳井了，大伙闻讯都跑到了井边，其中有我七爷。七爷本是个大少爷气味很浓的人，但出于义愤，竟自告奋勇，下井把二姨奶打捞上来。井约有十丈深，打捞上来时，人已经死了。衣服用针线缝得严严实实的，这说明她跳井是早有准备的。二姨太自杀前还在县女子高小读书，在当时也算个小知识分子了。死后六爷说她是跳井死的，不吉利，不让尸体进家，就放在他家大门外的一张破板子上。她娘家来了不少人，也只能在门外尸体前痛哭了一阵子离去了。我当时年纪还小，大约十四五岁，但对二姨太的悲惨遭遇却是非常同情的，看到她自杀后还受到这样非份的待遇，更是气愤，就和同族兄弟学超二叔康永升的儿子（与我同岁），一起将她的尸体殓入一具棺材，拉到后山岭上埋葬了。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说明了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和不被当作人看待，也说明了旧中国的落后及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妇女的残酷迫害。现在每想起这件事，仍是极其义愤的。

我的家乡还有个叫康宏佑的财主，是河南一带有钱有势的人家。据说曾挂过千顷牌，人称“康百万”。河南、陕西、山东到处都有他的栈房、土地。康百万除了他家的大庄园，还建有一座相当可观的山寨庄园，在我国北方可能也是少有的。现在开办了个展览馆，供游人参观。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逃往西北，据说回京的途中经过巩县，康百万亲自去黑石关接驾，并向慈禧进献了许多金银财宝，慈禧为此曾加封康百万，因此更加不可一世。我小时候见过康百万，村里每有热闹的说书、唱戏，康百万家里都是几辆很漂亮的轿车，拉着家里人放在最优越的地方观看，一般人都站在下边看，对其在乡里的罪恶行径，也有耳闻目睹的。他家的子弟也都是胡作非为，吃喝嫖赌之徒，我本家六爷开的大烟馆，主要是这帮人光顾。

旧中国人民灾难深重，中原大地更是历经磨难。辛亥革命确曾给人们带来了一线希望，对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活动也耳闻目睹，他们在一些较偏僻的地方山寨召开秘密会议，进行秘密活动，在群众中做宣传革命的工作；如提倡放足、剪发、领导学生砸神像、反对封建迷信等。我也曾参加过砸神像等这些活动。当时这些活动还是有点革命气氛的。可惜，后来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中国仍“徒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进而袁世凯“称帝”，引起护国运动战争。此后，形成了封建军阀割据，皖、直、奉系军阀都曾“逐鹿”中原，北伐后，新旧军阀又混战于中原。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胡景翼西北军，张作霖的东北军

在我的家乡进进出出，而吴佩孚就曾盘踞洛阳，据说他是想以洛阳为依靠，逐步建立霸业。我上小学，是北洋军阀占统治地位时期。一次吴佩孚从北京回洛阳，到巩县，县里政府官员，把中小學生都调去摆场面，到车站去欢迎，我远远看见吴佩孚满身披挂，留着小胡子，前呼后拥，一副不可一世的军阀派头。在当时，各军阀除了冯玉祥将军的部队纪律比较好以外（冯军曾驻家里，在前院，未进后院，纪律好），其他的都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祸国殃民，那一幕幕惨痛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的家地处嵩山和邙山的环抱之中，洛河从中间穿过，既有诸多的矿藏，又有丰富的物产。本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富饶的地方，但是，由于军阀的蹂躏和反动官府横征暴敛，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看到的却是满目的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铤而走险之徒，相结成匪，一股股四处游动，绑票抢劫事件经常发生。我的大爷康方正就被绑过一次票。他在东山开煤窑，手里有钱，有点名气，一天就突然被绑架了。家里人知道是土匪绑走了，就赶快派人打听，凑钱赎人。结果，在土匪窝里扣押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钱才把人赎出来。

我六岁时，我二爷在家门口一个下半山窑洞里办识字班，我和本家的同辈孩子去学认字（学方块字）。七岁正式到村里私塾读书。那时一般先读《百家姓》、《三字经》，后读《四书》、《五经》。《四书》我全读完了，《五经》只读到《诗经》，其它未读（老师姓白，孝义人）便转入本村小学堂

读初小课本。学校设在本村一座大庙里；老师是我的一位本家伯父，小学课本就是：“人、手、足、刀、尺”之类，比起私塾容易多了。

我的外祖父焦建功，住在我家村北五里地的焦湾村，是清末秀才，在我的家乡方圆几十里内是位很有名望的私塾先生。因此，乡里乡外许多希望自己的子弟有所成就的人家（岁数较大的学生），都把子弟送到他那里就读。直到我上大学预科时，外祖父仍在教私塾，而且学生还是不少的。那时读书就是死记硬背，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背不下来时，轻则罚跪，重则打板子。还有每天中午都要写字，写不好同样要打板子。当时的学生，不挨板子者不多，所以学生见了先生犹如鼠之避猫。我的二舅父也教私塾，其中有一年是跟二舅读的，那时我挨板子比别人少的多，因为常常受到外祖母的保护。记得有一次书未读好，二舅罚我在毒日下跪砖头，外祖母闻讯赶来把二舅骂了一顿，我当即就被“解放”了。

那年代，决不象现在的人们安居乐业，而是经常逃避兵荒匪乱。记得军阀胡景翼的军队属于西北系统，他打了几仗，部队被打散了，成群的散兵游勇，狼狈不堪的从我家村前往陕西跑，因为胡景翼是陕西人，他的兵也多是陕西人，纪律很坏，群众对他的部队反感很大。看到他败了，村里群众组织红枪会以自卫，见到他的兵能杀的就杀死，或用石头打死，人多打不了，就放他们走了。总之在我的家乡，群众打死不少胡景翼的兵，这是我亲眼看到的。